

# 权力结构导致分配不公

在社会个体之间,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重要因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你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从减少权力在机会分配中的作用开始,这是源头。否则,单纯从税法上改革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公,也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最高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好”,地区市“第三好”,等等;大学资格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

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军官沈星、最美警卫战士高铁成、最美司机吴斌、最美路人周冲,还有最美清洁工、最美护士、最美孕妇……仿佛一夜之间,生活中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最美”,我们的社会正在成为“最美”竞相绽放的花园。在“最美”频频出现的背后,还有另一些记忆犹新的事:彭宇案、药家鑫案、小悦悦事件,以及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在某种层面上,这些事件引发的道德焦虑催生了当前“最美”人物的井喷。媒体的善意不难揣测。无疑在帮助人们重新树立道德信心方面会起到正面作用。

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警惕过犹不及。传播学里有条规律,宣传最初可以使人们形成某种印象,接下来,人们便去检验这种印象的真伪。一旦检验的结果与宣传内容不相符,人们不仅不接受宣传内容,而且对宣传者也产生怀疑和抗拒。当前,媒体似乎正在走入拿着放大镜寻找“最美”的极端思维,一心突出“最美”,把与之相对立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事情都做了冷处理。这种苦心营造的美好局面,在现实的冲击下,难免会让人们得出媒体说谎的结论,削弱最美人物的影响力,甚至生出对媒体的不信任,损害媒体的公信力。这都是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

## 新锐短评

## 做公民,在混乱中保持清醒

9月15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许多人记住了李昭的身姿: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的马路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这张令人动容的照片,在微博上被转发10余万次,网友评价:“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在翻滚的废气面前,李昭是勇敢的;在非理性的盲目面前,李昭又是清醒的,因而显得可贵而可敬。我愿意把李昭看作一名合格的公民。公民,不是虚空的概念,更不是脸谱化的标榜。公民,有勇气做什么,更有勇气不做什么,从人群中抽离出来,向暴力说不,就是公民。(摘自《中国青年报》9.20 王石川/文)

## 反腐无需“别开生面”

近日,广东省四会市送官市人“廉政读本”监督配偶做好官,并组织所谓别开生面的“廉政课”。现如今,不少地方和部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推出一些反腐倡廉的“新举措”,并且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游戏化”,看谁更“新奇”、看谁更“别开生面”。然而,这些花里胡哨的“新举措”,看起来轰轰烈烈,至于最终效果如何,似乎从未有人深究过。反腐倡廉不是小孩过家家、玩游戏,不需要“别开生面”,只要老老实实做点实事就行了。比如说“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大多数国家早已推行多年,经验成熟、效果显著,何不拿来一用?(摘自《法制日报》9.24 乔志峰/文)

## 两种“闰土”

今天的社会有太多钱理群先生指出的精致利己的国民。无论他们多么成功,在民众眼中,在网络等及时有效的舆论监督里,他们是缺德的,是专横的,是丧失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是没有品格和人格的。今天的社会,既有穷苦人的失落,也有暴发户的失落。观察今天中国社会的人,可以说,很多人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一种是麻木的闰土,一种是精明自私的闰土。所以,不要在小康生活、物质生活中陶醉,要去了解我们跟现代公民之间的差距。(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34期 余世存/文)

责编/苏露锋 美编/胡晴 照排/姚慧 校对/沈皓玮

责编/刘文 美编/胡晴 照排/姚慧 校对/钟智勇

本质主义乃近代西方思想主流之一,它认为事物只有一种本质,不存在千差万别的形态。这与中国传统的“一以贯之”有不谋而合处。在本质主义影响下,被庸俗化为某种意识形态、真理、主义的“唯一”、“绝对正确”。

比如,有人将现代化的本质理解为“高大雄伟、焕然一新、欣欣向荣”,于是千差万别的传统建筑、栖居方式就是落后,非现代化的象征,全部摧毁。新的就是现代的,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速公路、西式小区……成为现代化的唯一象征。

本质正确,那就怎么都行。有人违反了纪律,但“这个同志本质是好的”,就算违反,也可以从轻发落。“他如此做是因为正义感”,正义感绝对正确,因此违反法律也要同情支持。在“文革”中,这种

“凡是正义,怎么做都行”达到极端,为了捍卫“正义”“真理”这些概念,有人甚至可以出卖父母、消灭亲人肉体。一旦依据“本质”被划为敌人,哪怕人们的自然身份是父老乡亲,都要被冠以“阶级敌人”镇压。那个时候,依据虚构的本质来划分现象,就连画栋雕梁、西装领带等物品也是依据“本质”划分的。比如,红军穿草鞋、打红旗,因此草鞋、红布是光明的象征;文房四宝是皇室贵族的爱好,因此是黑暗的象征。甚至荒唐到植物也有反动植物。日常生活中,戴个耳环,插朵牡丹,听梅兰芳、贝多芬、莫扎特,欣赏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都成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

本质主义盛行,也与教育有关。应试教育其实正是一种本质主义教育,它不是培养学生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事能力,而是绝对化地认定世界本来有某种唯一正确之本质,通过量化本质将学生的思维同质化。本质主义貌似很安全,但却非此即彼、唯一答案、绝对正确、绝对理性,正是非理性的温床。(摘自《南方周末》9.24 于坚/文)

责编/刘文 美编/胡晴 照排/姚慧 校对/钟智勇

# 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

2009年年初,苹果总裁乔布斯被查出肝硬化晚期。医生告诉他,必须马上进行肝移植,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乔布斯同意了肝移植手术方案。院方马上为乔布斯在加利福尼亚州肝移植中心进行登记,等待肝源。

可院方发现,要进行肝移植的病人很多,如果排到乔布斯至少需要10个月时间。为了尽快挽救乔布斯的生命,院方马上又为乔布斯在其他州进行了登记。几个州最快的是田纳西州,但也需要6个星期才可以等到。于是,有人找到医院院长杜尔先生,希望他行使一下院长的特权,先给乔布斯移植。

杜尔先生听了,皱起了眉头,他无奈地耸耸肩,说道:“我哪有这个特权让乔布斯插队?如果让乔布斯先移植了,那么其他病人怎么办?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啊。”有人又找到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雷德森,希望他能帮忙,给院方打个招呼,或写个批条,让乔布斯先移植。布雷德森听了,严肃地说道:“谁也没有什么特权能让谁先移植,谁可以后移植。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大家只能按排队秩序来进行。”有人对乔布斯悄悄地说道:“看能不能花点儿

钱,给有关人员打点打点,让您先移植?”乔布斯听了,吃惊地说道:“这怎么行?那不是违法吗?我的生命和大家的生命是一样的,大家只能按照秩序排队!”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乔布斯,包括他自己。那些排在乔布斯前面需要肝移植的病人,有的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老人,还有的是失业者,他们都在按照顺序排队,等待可供移植的肝脏。6个星期后,乔布斯终于等来了可供移植的肝脏。可是,由于等待时间太长,乔布斯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这次移植,只延长了乔布斯生命2年多点时间。但是,乔布斯无怨无悔。他在生命最后2年多的时间里,依然为苹果公司开发出更加新颖的苹果产品,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乔布斯传》作者艾萨克森深情地说道:“生命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平等不是口号;平等不是作秀;平等更不是交换;它是生活中最生动、具体的体现。它如明月般皎洁,光可鉴人,散发着圣洁的光芒,它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直抵我们内心的柔软。”(摘自《新一代·上半月》木子良/文)

责编/刘文 美编/胡晴 照排/姚慧 校对/钟智勇

# “文革”时山西一村改姓“毛”闹剧

文化大革命初始,为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山西省一个村子发生了一件罕见的荒唐事:全村所有人竟全部改自己的姓为“毛”,结果闹出一连串麻烦……

### 忠不忠看行动

1979年冬,我(李燕华)被借调到山西太原市一研究所工作,并参与了该研究所的拨乱反正和冤案平反。趁下乡检查“村村通电话”工程之便,同该所科技处李处长到一位耿姓干部老家吕梁山区的一个公社走了一趟。

那位姓耿的干部,工作一贯积极,但长期争取入党而未获解决,后来又出现了新花样:档案材料中,家庭成员本应姓耿,中间姓毛,后来忽然又姓耿,其奥妙没人能解释。我们去他家乡走了一趟后,终于了解到“文革”期间在那里发生过一起世所罕见的荒唐事。它起始于1969年,前后历时七载。

1969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该公社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形式表示庆祝,会上来自各大队的积极分子纷纷上台代表本大队向毛泽东表“忠”。

有的说,本大队将在一个月内人人背得出“老三篇”;有的说,本大队半个月内家家门口竖起毛主席像;最后那位姓耿干部所在大队的积极分子代表、大队民兵连长跳上主席台,挥拳高叫:“忠不忠,看行动!俺全大队贫下中农3天内全都改姓为毛。”

此语一出,其他大队的代表统统败下阵来。

### 欢天喜地改姓

民兵连长回到村里后,连夜发动大队党支部讨论成立“改姓毛”领导小组。规定贫下中农成分的一律改姓毛。

# 谷牧首次访问西欧感受差距太大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团出访西欧,感慨万千。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多次讨论,归纳起来有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合作发展?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不用谈判,现在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到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延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贷款付账,以后还贷)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天后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报告,送呈党中央、国务院。其中一些重要建议和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摘自《谷牧回忆录》谷牧/著)

责编/刘文 美编/胡晴 照排/姚慧 校对/钟智勇

这位民兵连长粗中有细,考虑到改姓后由于同姓不结婚的村习,会给本大队姓毛的男孩带来找对象的困难,还建议了一条优惠政策“外来女孩凡愿嫁给本大队姓毛男孩的,可赐姓为江”,以示伟大领袖毛泽东与革命旗手江青“革命联姻”代代相传。此荒唐的建议居然在大队党支部获得通过,他们决定在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下面附设临时机构“改姓毛办公室”,挂出牌子,并委托那位民兵连长主持执行。

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一清早,用高音喇叭把前夜的决定通报全村,要求统一行动。村上顿时大哗:“是哪个想出这主意的来,连他祖宗也不认了!索性把他家的祖坟掘掉算了。”于是民兵连长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开会打通思想,反复说明“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道理,经过一天的吵闹,全大队7个小队中有两个小队同意“改姓毛”,其中包括该研究所那个姓耿干部的家所在的小队。

再接下来由那位民兵连长亲自挨家挨户访问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登记改姓毛的名册,如此连闹3天才得以完成。在这3天中,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中,凡是心底拥护的,都将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姓”为荣。3天后,这两个小队贫下中农全姓毛了。于是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将名册连同户口本敲锣打鼓送到公社派出所登记。

公社派出所所长一听此荒唐事,大为光火:“你们疯了!姓氏一改,阶级敌人全不见了。”那民兵连长不服:“咱贫下中农都姓毛了,谁是阶级敌人还不一目了然,凡是不姓毛的,全是阶级敌人,今后公安无事可干,蹲大坑、喝二

锅头就是了。”控辩双方论点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争得难解难分,该村的“改姓毛”运动搁了浅。

2012年9月28日 星期五 第39期

# “文革”时山西一村改姓“毛”闹剧

文化大革命初始,为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山西省一个村子发生了一件罕见的荒唐事:全村所有人竟全部改自己的姓为“毛”,结果闹出一连串麻烦……

### 历时七载落幕

“改姓毛”后真有说不完的倒霉事:外面汇钱来,因名字对不上,邮局不给领,急得团团转;去畜牧场买猪饲料,因饲养户名字同原先留底的不一致,不给货,栏中的猪饿得哇哇叫;送去当兵的因户口本上姓名同档案中姓名不符,被怀疑企图潜入党部。当然还有间接倒霉的事,如本文开始时说的研究所内那位姓耿的干部,因其档案中父亲、弟妹的名字前后不一样而影响到他的入党,不一而足。“改姓毛”几年后,毛泽东去世,吕梁地区这两个小队改姓毛的贫下中农们以“毛家人”自居,也有模有样地设灵祭奠,披麻戴孝,还带着赐姓为江的媳妇们,往北京给江青发慰问信。

正当他们伸长脖子等待北京回信来认亲时,江青成了头号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村上立刻大乱,嫁进来后改姓江的媳妇们起哄:“还我原来的姓,要不便离婚!”她们扯了毛的丈夫也终于醒过来,纷纷要求改回原姓。(摘自《各界》李燕华/文)

近日,北京女孩赵萌萌(网名“大萌子”)将她 and 父亲每一年的合照上传网络,“你长大了,我变老了”的变化感动了上万网友,被转发超过18万次。

赵萌萌说,这组照片是她送给父亲的一份父亲节礼物。她两个月前上传到网络,没想到现在突然一夜爆红。照片的摄影师是赵萌萌的妈妈,每年生日的前后,妈妈都会为赵萌萌和爸爸拍一张合影。在这组图片中,赵萌萌除了标明拍摄地点、年龄,还写下了一小段当年的小故事。

### 朴素是赵萌萌对7岁最直接的回忆

7岁时,赵萌萌已经在小学读书,在这一年夏季的某一个周末,赵萌萌穿着带有黑色斑点的的确良小粉裙和一双雪白的尼龙袜,她羞涩地站在父亲前边,还有一些小兴奋。母亲已经准备好了相机,固定下了这个瞬间。的确良和尼龙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整体的记忆,再次看到7岁时的照片,赵萌萌还有些怀念的尼龙袜和的确良小粉裙。

### 14岁时爸爸下岗了当年的照片看了心酸

每次看到14岁时的照片,赵萌萌都会觉得心酸。父亲从一家机关单位的杂志社下岗。之后,父亲想自己创业,但都没有成功。家庭生活、工作的压力,让全家人

# 用《送瘟神》的配乐欢迎外国贵宾

1968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为了宣传这一“伟大成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彩色纪录片。该片上映后,有人向江青打小报告,说这部纪录片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中抄袭而来,江青闻讯勃然大怒,由此掀起了一场大批判风波(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被视为中国头号敌人)。

在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年代,给纪录电影配乐本来是相对“保险”的行业,但此事却使配乐者也“噤若寒蝉”,不敢创作、发挥,只能从当时屈指可数的“钦定”这部影片的音乐作配乐。徐景贤回忆:“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审看’一部某国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南方的彩色纪录片,一听音乐我们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部欢迎外国贵宾的影片配乐,竟是《送瘟神》!”

(摘自《同舟共进》雷颐/文)



# 30年合影的时代痕迹

很少再出去专门照相。为了缓解家里的压力,赵萌萌一家人到大观园去散心,父女两人再一次站在镜头前,照片里她父亲明显苍老,而面带微笑。

### 看到红裙子的照片就想起相亲的事情

10岁之前,她总是站在父亲的身前,随着个头的增高,渐渐站在父亲一旁,父亲总是用肩膀搂着她,呵护着女儿。19岁时,赵萌萌站在父亲旁边,用手挽着父亲。大学毕业时,赵萌萌23岁,父母送了她一套红裙子,开始为她张罗着相亲。“周围人普遍认为大学毕业头两年是女孩择子相亲的黄金期,邻居和亲戚也不断找上门来。”赵萌萌看到红裙子的照片,就想起她相亲的事情。(摘自《东方早报》8.24 权义/文)

